

· 专题论文 ·

毛泽东与大比武运动的中止

朱之江 张 陈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 科研部, 江苏南京 210003)

摘 要: 毛泽东的态度对大比武运动的发展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深刻理解1960年代解放军军队建设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对大比武运动的态度经历了由赞赏到失望的变化,他对大比武军政训练结合不紧、聚焦实战需求不够、普及工作推进缓慢等方面是不满意的,这种态度变化由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和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所决定,同时也深受国内政治上“左”的错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毛泽东 大比武运动 郭兴福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 K27; E29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451(2017)01-0089-09

Mao Zedong and Termination of the Grand Contest

Zhu Zhijiang Zhang Chen

(Department of Military Thought & Military History,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Nanjing, Jiangsu 210003;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Nanjing, Jiangsu 210003)

Abstract: Mao Zedong's attitude had vital influence on the process of the Grand Contest, which serves as the key to achieving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 military construction in the 1960s. Mao Zedong's attitude towards the campaign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from appreciation to frustration. He was dissatisfied with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work and military training was slack, the focus on actual combat was inadequate, the popularization process was slow. This change of attitude was determined by the then grave 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and Mao Zedong's strategic guiding ideology, and it was also affected by leftist-inclined mistakes in domestic politics.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Grand Contest; Guo Xingfu teaching method

1961年10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军训通讯》向全军推广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①,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下达《全军应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军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把军事训练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1964年4月中旬,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从5月上旬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规模空前的全军大练兵、大比武运动在中国天南海北陆续展开,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史上的重要一页。1965年初,高潮初显的大比武运动却迅即趋冷,这令人感慨。当时,中共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大比武的具体态度如何?对大比武运动由热到冷的快速转变又当如何看待?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军史研究”(14GJ003—087);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十二五”计划重点课题子课题“人民军队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的历史考察”(15ZY01—02)

作者简介:朱之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讲师。

①郭兴福时任南京军区第12军第100团第2连连副连长,在任期间负责连队军事训练工作,在军领导和有关部门帮助下,他总结出一套新的教学训练方法,即郭兴福教学法。

目前学界对这些问题鲜有论及。^① 本文聚焦毛泽东对大比武运动的态度变化,力图解开大比武跌宕起伏、从高峰到低谷、由辉煌走向悲壮之谜,并在把握大比武发展变化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深化对其教训的认识,推动解放军军事训练史研究的深入。

一、毛泽东对大比武运动态度的变化

大比武自兴盛起,短短一年左右,毛泽东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赞赏到失望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无疑对大比武有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赞赏,大比武的高潮不可能真正显现;离开了毛泽东的关注,大比武的高潮也难以持续。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必然现象。

毛泽东最初对大比武运动发表意见,是在 1963 年年底审阅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会主任叶剑英的《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报告之时。在报告中,叶剑英肯定郭兴福教学法是对人民军队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并归纳了其特点,建议全军“学习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发扬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培养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借以掀起一个军事训练的高潮”。^② 对此,毛泽东在口头上予以肯定。据《罗瑞卿传》记载,一是当看到报告中说“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毛泽东在下画了一道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二是毛泽东说:郭兴福教学方法对传统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三是毛泽东指出:总参谋部镇江现场会“到会的多是‘后排议员’,难以推广,必须让‘前排议员’到会,一把手亲自抓”。^③ 《叶剑英年谱》则记载,毛泽东看后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④ 显然,毛泽东对郭兴福教学法较为赞赏,并提出了加强推广的要求。

大比武运动逐步展开后,1964 年 6 月初,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毛泽东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⑤ 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大比武运动的期待之情。随后,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副主席、罗瑞卿总参谋长等人的周密安排下,毛泽东于 6 月 15—16 日在北京西山、阳坊和十三陵观摩了比武,检阅了训练成果。期间,毛泽东就训练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等等。^⑥ 可以说,零距离亲身感受大比武运动后,毛泽东虽然对比武尖子们的成绩大加赞扬,但对比武这种形式本身未有明确的评价,相反提出了许多要求,似有不放心之感,并强调“要从困难着想,不管什么问题只要从困难着想就不怕,所以不妨把困难想多一点,想尽。”“不要只看到好的方面,要两分法。”^⑦ 这说明大比武距毛泽东的预想还有一定差距。7 月 2 日,在谈及军事战略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看了北京部队、济南部队的尖子分队的表演,

^①任兆瑞、李成安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军训练改革的历程及启示》(《军事历史研究》2013 年第 3 期),刘祖爱、肖学祥的《论 1949—1964 年我军军事训练转变的历史经验》(《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对大比武运动进行了简要评价;汤家玉、张久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比武”始末》(《党史纵览》2003 年第 2 期),于化民的《1964 年全军“大比武”始末》(《党史博览》2003 年第 2 期)等详细介绍了大比武运动的过程,并认为林彪的强势干预和污蔑,阻碍了大比武运动的继续开展;仲华的《论叶剑英对“大比武”的突出贡献》(《军事历史》2014 年第 5 期)论述了叶剑英在“大比武”启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目前尚无专文研究毛泽东对大比武运动的具体态度,对大比武运动由盛转衰的深层原因也未施笔墨。

^②《叶剑英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909 页。

^③《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第 284 页。

^④《叶剑英年谱》(下),第 910 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5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45 页。

^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62 页。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228 页。

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8月下旬,总参谋部军训部制订了《在军事训练中推广和普及“尖子”经验的规划(草案)》。

11月30日,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林彪认为大比武影响了“四个第一”的落实,提出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要“突出政治”。^②12月29日,林彪召见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强调“我们的军队是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帅军事,军事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③在此基础上,他一方面要求“军事训练一定要搞好,使部队的训练正常化”^④;同时又提出“今后两三年内都不要搞全军的比武,军区、军、师大规模的比武也都不搞。”^⑤这个讲话精神被整理成《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并附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呈报毛泽东。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照此执行”。^⑥8天后,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余秋里工作汇报时,再次肯定林彪的做法,强调“就是这样,不要搞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要搞那些花样。戚继光在他著的《兵事要略》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⑦这已不是“尖子”经验普及的问题了。就这样,仅半年时间,大比武运动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逆转。

二、毛泽东对大比武运动不满意的主要方面

从期待到失望,最明确的表达莫过于毛泽东1965年初与余秋里的那段谈话“不要搞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要搞那些花样。”“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⑧在毛泽东看来,大比武讲究形式多了,有华而不实之嫌,令人遗憾。

第一,大比武没有将政治训练与军事训练紧密结合起来。战争年代的大整军大练兵一直是解放军引以为豪的典范。那时的大练兵都是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并重且紧密结合的,多以整军形式出现。有关毛泽东人民军队军事训练思想最经典的阐述,莫过于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中关于怎样练兵问题的阐述。朱德指出“练兵分三方面:一是智力、二是体力、三是技术。”“练兵首先是练智力。政治觉悟不高,不懂得为什么打仗,就没有积极性,兵也就练不好。没有政治觉悟的勇敢,只是血气之勇,有了政治觉悟的自觉的勇敢,乃是大勇。为了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知识,又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作为基础。”^⑨对于练兵中政治训练的重要性,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还曾特别强调“整训开始时,还应着重政治方面,着重于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发动干部与战士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军事整训才易于实施与更有效果。”^⑩

毛泽东最初对大比武充满期待得益于郭兴福教学法,对这个教学法能够“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对这个教学法狠抓思想激发练兵自觉的做法,他非常感兴趣^⑪,而这正是从政治训练与军事训练结合上着眼的。但总体而言,大比武在这方面未能令毛泽东满意。

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69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第384页。

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70页。

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70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第384页。

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70页。

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72页。

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72页。

⑨《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4页。

⑩《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259页。

⑪《罗瑞卿传》,第284页。

1960 年代初期,全军正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同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逐步展开。对于后者毛泽东尤为关注,1963 年底,他专门给林彪写信询问部队宣讲活动的部署和开展情况,略带督促口吻地写道“据我从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宣读。”在毛泽东看来,“此事其实不难”。信中,他提出一个粗略方案,要求林彪“和罗(瑞卿)、肖(华)诸同志商酌处理。”^①对这些活动的内容,大比武没有给予足够体现。在罗瑞卿看来,这些内容很难用比武的方式加以展现。他在指导成都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工作时,针对成都军区比武大会准备设立比学毛泽东著作的项目,就指出“政治怎么个比法?光讲革命化,没有成果不行,不能服人。四好中政治思想好同其他三好不能分离。学毛著好自然不等同于军事训练好,但是毛著学习应当是苦练军事技术的思想基础。”^②在处理学习毛泽东著作典型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与军事训练典型的关系问题上,罗瑞卿于 1964 年 4 月底发出指示“武的宣传郭兴福,文的宣传廖丰黄,到一定时候,再把这二者结合起来。”^③这时距毛泽东检阅大比武只有 1 个半月了。因此,不难理解,检阅大比武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对比武中官兵的政治热情和战斗精神未作明确评论,反而强调“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前一个“文”字,相对武而言,指的就是政治,正如 1963 年初,听取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关于中印边境东段自卫反击作战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他所说的“总是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④显然,大比武中毛泽东担心的是政治训练。大比武的军事色彩给毛泽东的印象很强烈,但政治训练方面,至少透过比武现场,他没有感受到太多震撼。

第二,大比武聚焦实战需求不够。强调夜战近战,狠抓基层单位的基础训练,是当时指导解放军训练的重要思想。这一点高层没有原则分歧。毛泽东在听取张国华关于中印边境东段自卫反击作战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说“对帝国主义,我不信当了面打近战、夜战我搞你不赢。”^⑤叶剑英在广州军区召开的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座谈会上,也强调“我们的战术,主要是同敌人打近战、打夜战,就是躲开敌人的远战火,保存自己有生力量,依靠我们手中武器,同敌人打近战、夜战。近战、夜战在未来战争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起决定性的作用。”“基层单位基本功夫过硬了,我们就在近战、夜战中战胜敌人。这是我们战胜有原子弹、导弹的敌人的主要办法。”^⑥

但对基础训练如何把握,特别是落到实践中,毛泽东与大比武组织者强调的重点不尽相同。叶剑英强调“只要我们在二百米内的功夫能过硬,能硬过敌人,我们就能够战胜敌人。”“要真正发扬近战、夜战威力,战胜敌人,必须抓紧基层单位——一个班,一门炮,一辆坦克,一架飞机,一艘舰艇的基础训练。”^⑦罗瑞卿也强调:要“着重练单兵和小分队,练五大技术。”^⑧这是从军兵种技术角度把握基础训练的。而毛泽东则更多的是从作战任务出发,根据近战夜战的需求来强调基础训练的。检阅大比武观看北京军区坦克汇报表演时,毛泽东说:那样多坦克,打起仗来你躲都躲不赢,不要说打敌人了;“坦克受地形限制很大,有些地方不能用。打仗主要还是靠步兵,靠什么地方都能走的,武器靠背得动的(拖、拉、人扛)。”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说“坦克是一个兵种,这种武器还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 年,第 449—451 页。

②《罗瑞卿传》,第 288 页。

③《罗瑞卿传》,第 289 页。

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第 192 页。

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第 193 页。

⑥《叶剑英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第 581—581 页。

⑦《叶剑英军事文选》,第 581—581 页。

⑧《罗瑞卿军事文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年,第 697 页。

是要用。”毛泽东说，“不是不要，是不能只指望这个”。^①显然，在毛泽东看来，近战夜战的主力是步兵，大比武课目设置应向步兵聚焦。

此外，毛泽东还强调“要从困难着想，不管什么问题只要从困难着想就不怕，所以不妨把困难多想一点，想尽。”^②在要求增设游泳训练课目时，他又特别强调“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③此前，游泳从未被列入解放军基础训练的课目，毛泽东提出这个要求富含深意：必须根据近战夜战的需求增设课目，游泳作为基础训练也要根据实战从难从严，而不是简单地在游泳池中比速度比耐力。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观看白天训练课目时，毛泽东为什么反复强调“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④其言外之意，基础训练必须真正体现夜战近战的要求，而不是简单地强调白天训练。在观看射击表演时，有战士没有百发百中，贺龙说“因为主席来看，有的战士太紧张了。我看的时候，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好多都是百发百中。”毛泽东却说“紧张了还是不错……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⑤显然，在肯定战士射击成绩的同时，毛泽东并不认为，在这种最基本的白天训练上追求完美对提高近战夜战能力有太大的意义。对此，部队中确实存在疑惑，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在1964年7月底的一次装甲兵院校工作座谈会上，就将提高夜战能力，“战术训练以白天为主，还是以夜间为主？”列为院校训练中需要正确认识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⑥

第三，大比武的普及工作推进缓慢。大比武最初的动议是为了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进而检验和展示推广后对全军军事训练带来的巨大成效。1962年初，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教学法的南京现场会议后，罗瑞卿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经过这次现场会议的推动，可能会很快地在全军的军事训练中掀起一个比学赶帮超的热潮，促使广大的基层干部开动脑筋，下决心练本领，也促使各级领导不断提高领导艺术，改进领导作风，从而使全军的军训工作出现新的面貌。今年是国庆十五周年，已经决定不阅兵。我们打算在下半年的适当时候，举行一次全军性的比武运动大会。”^⑦按照罗瑞卿总体设想，就是“抓住这个典型，总结经验，以推动全军的训练工作继续向前发展，提到更高的水平。”^⑧但大比武展开后，比武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尖子比武本身渐成瞩目的焦点，郭兴福教学法反而成了配角。毛泽东观看大比武汇报表演有步兵轻武器射击、3000米武装越野、“夜老虎连”夜间训练、侦察兵捕俘和攀登技术、汽车通过障碍与自救、坦克表演，及济南地区祖孙三代和女民兵对陆地和水上目标的射击等项目，这些项目或许都得益于郭兴福教学法作用的发挥，但从各种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大比武的组织者们主要向毛泽东展示的还是比武“尖子”本身的成绩。因此，毛泽东在观看半自动步枪快速精度射时，说，“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而没有提到郭兴福教学法及其普及效果问题。^⑨7月2日，毛泽东再次强调“看了北京部队、济南部队的尖子分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⑩又强调：部队要学游泳，“每师先搞一个团，每团先搞一个营，每营先搞一个连，然后再普及，做到全会。”^⑪显然，大比武并没有让郭兴

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63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28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28页。

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62页。

⑤《贺龙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359页。

⑥《许光达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555页。

⑦《罗瑞卿军事文选》，第698页。

⑧《罗瑞卿军事文选》，第698页。

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62页。

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69页。

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69页。

福教学法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9月16日,在各军区、军兵种军训部(处)长座谈会上,贺龙指示“我已向主席说了,两年可以把‘尖子’经验普及全军。我是根据部队的训练情况和士兵服役年限考虑的。今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出现了一批‘尖子’,我们要抓住‘尖子’不放,各级领导要亲自抓,要严格督促,定期检查。普及工作要造成声势,要雷厉风行,要像今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和抓游泳训练一样抓好普及工作,一定要很快搞出成绩来。”^①可见,两年要普及的是比武“尖子”的经验,这与郭兴福教学法不尽相同。但早在同年6月7日的济南军区军事训练观摩评比大会上,罗瑞卿却提出:“我们设想在今后三年内、五年内,所有基层干部,包括连排班,都要把郭兴福教学方法学到手,都要做到四会,就是会讲、会做、会教、会作思想工作;所有战士都要练成思想红、作风硬、熟悉本行业务,具有过硬本领的精兵。”^②这里包括了两项普及内容,而且前一项是后一项的基础。

1964年8月下旬,总参谋部军训部制订的《在军事训练中推广和普及“尖子”经验的规划(草案)》提出了普及工作的4条基本原则:一是应根据各军种各兵种各专业的特点来确定普及的水平,二是在普及工作中要求基层干部做到“四会”,三是普及的内容以实战需要为基本,四是普及前必须对“尖子”经验进行鉴定。《规划》还明确,争取在2年内把“尖子”经验基本普及全军。^③这意味着,罗瑞卿设想三五年内才能完成的2项普及工作,被压缩到了2年。贺龙设想2年要完成的1项普及任务,被扩大为教学法“四会”和“尖子”经验2项。但毛泽东所强调的基本是把现有“尖子”的经验尽快普及全军。

此前解放军历史上,有影响的整军练兵运动一般不超过1年,经验就能基本得到普及推广。如抗战时期,整训大练兵时间最长的一次在1944年前后,持续仅1年。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式整军运动基础上,全军普遍开展了以提高攻坚战、阵地战和大兵团联合作战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大练兵运动,未超过半年时间,全军战斗力普遍提高,为后来的城市攻坚战、村落攻坚战、诸兵种协同作战、大兵团联合作战等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东北人民解放军用时最长,也不过5个月。其整训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高度评价:东北部队虽然在1948年“上半年少进行了一个战役,但全军获得了整五个月的大休整”。^④“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⑤可见,大比武尖子经验普及推广要2年,大大超过历次整训大练兵的时间。对此,毛泽东很急切,特别强调:普及“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⑥在毛泽东看来,“单单武器的使用和训练士兵不需要很长时间。训练炮兵,一个月就行。训练驾驶员、飞行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⑦

三、毛泽东对大比武运动不满意的深层原因

1965年初,针对大比武,毛泽东讲“不要搞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要搞那些花样。”“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⑧不满之意和遗憾之感表露无遗。当年年底,毛泽东在林彪的报告中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

^①《贺龙军事文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613页。

^②《罗瑞卿军事文选》,第721页。

^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第344页。

^④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1948年9月22日,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54页。

^⑤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9月8日,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3卷,第254页。

^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69页。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03页。

^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72页。

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①这意味着对大比武的否定和放弃。毛泽东的这一态度虽与林彪摆弄是非、攻击罗瑞卿等密切相关,但从宏观角度看,主要原因在于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及毛泽东的战略指导。

1960年代,美苏冷战争霸加剧,国际局势动荡。中国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南遭美国的战略围堵,北受苏联的军事压力,西有咄咄逼人的印度,东南是念念不忘“反攻大陆”的国民党蒋介石。特别是1964年起美国加快侵越战争步伐,中国面临的战争威胁不断升级,至一年后美国直接出动地面部队侵入越南,对于中国来说,战争威胁达到自抗美援朝以来最严重的程度。面对严峻化的国家安全形势,中共中央对战争爆发的预期明显增强,先是制定了“备战整军”的方针,随后又形成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中国全面进入临战状态。

临战状态下,毛泽东加快战备进程的意愿非常强烈,大比武显然不适应临战状态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对于战争威胁,毛泽东毫无畏惧,1964年9月,会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时,他说,“我们还没有核武器,但谁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②;1965年的一次高层会议上,他强调“现在不是列宁那个时候了,列宁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个妥协条约,为的是保存力量。现在是我们要胜利,南越打了一年了,我们搞计划,不能放在不敢打上。”^③另一方面,作最坏打算,毛泽东特别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甚至觉得战争已然不可避免不如早些到来。针对战备建设舍不得投入的侥幸心理,他一再指出:“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敌人来了总要打掉一些坛坛罐罐。不是浪费,敌人不来也不是浪费。”^④总体来看,或许由于对未来中国有着深深担忧,毛泽东在战争问题上不如以往淡定,多少存在些焦虑和急切。1964年7月初,在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工作时,他说“趁我们还在的时候再打它一仗,也好。”^⑤半年后,针对东南亚形势和军事援越问题,他又说:“要打就早点打,趁我们还活着打完这一仗。”“要准备今年、明年、后年打仗。”^⑥强硬且略带焦虑的心态决定了临战环境中的毛泽东,在战备建设上必然要求往前赶、往实里抓。1965年10月,对大小三线建设,毛泽东就要求提前完成,明确指出“余秋里报告提准备五年,我说要争取三年半或更多一点时间(今年下半年算在内)。”^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军事训练上,他更强调实战性,期望加快进度完成大比武“尖子”经验的普及。在这一点上,罗瑞卿的认识与毛泽东有较大差距。1965年,罗瑞卿总结大比武运动4条经验教训,其中一条是“急”,即要求太急,有的军区要求1年完成2年的普及计划,到下面就变成4个半月,有的连变成2个月完成。^⑧

在临战状态下,毛泽东还高度关注提高军民总体力量,确保战争初期主动,谋求打赢人民战争,大比武显然不太契合这一主线。1965年5月,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纪要提出:“战备工作要有重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搞好部队的武器装备,不能搞全面紧张、全面膨胀。海军、空军、导弹、坦克、大炮,凡是临时来不及搞的现在就搞,来得及的,现在就不搞。最关键、最主要的是搞好三种准备,即军事思想的准备、军事上物质基础的准备和军队的政治工作。”^⑨

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45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64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27页。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43页。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44页。

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87页。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27页。

⑧转引自闫奎奎《六十年代大练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297页。

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95页。

对此,毛泽东表示赞同。可见,军事训练并非重难点。自从 1958 年反“教条主义”后,苏军的军事训练模式被否定,和平条件下解放军如何通过训练提高战斗力,一直处于探索当中。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方面解放军的经验非常丰富。因此,在临战状态下毛泽东越来越倾心于后者。检阅观摩比武后不久,在会见越南人民军参谋长文进勇时,他不无羡慕地说“我们现在哪里都没有战争。我们得不到更多锻炼的机会,我觉得有点可惜”,越南人民军“有机会在南越战争中训练军队,很好。”^①半年后,在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他又说,“战场就是学校”,“战争就是学习”^②。再过半年,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时,他仍说“打仗并不是很困难,一打就会。敌人就是我们的教员。”“不要迷信军事科学,只要去打仗,一点也不难学会”。^③显然,战备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与其寄希望于战前训练,投入大量精力,不如力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换言之,毛泽东似乎并不怎么担心部队战斗力问题。

相比较而言,军队的政治工作显得更为重要。根据人民战争的发展特点,军队政治工作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964 年 6 月,检阅大比武的当天,毛泽东召集高层会议,否定了北顶南放,提出“不能放在顶得上。所以各省要搞民兵、地方部队,省、地、县都要搞,不要靠中央,不要只靠几百万解放军。这么大的国家,这样长的战线。”^④实际上,就是从应付最困难的情况出发,战争初期要求各地能迅即依托民兵、地方部队,独立展开作战,形成人民的战争,实现“人自为战”。^⑤能不能形成这种状态,应该说军民团结、军队内部团结是基础,关键是看政治工作的成效,军队肩负这方面的重要使命。令毛泽东担忧的是,这方面问题很多,很薄弱。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现在军队就是搞些生产,不大做群众工作了。我们还是要恢复过去的三大传统,要准备打仗,要生产,还要做群众工作。”“现在搞地方工作,就不大问军事了。军队的同志搞了军事,也不问地方工作了。这都不对。搞地方工作的要管军事,搞军队工作的也要管地方工作。”^⑥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认为“军队动起来,还可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又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⑦简言之,毛泽东历来把打仗视为政治问题,他曾明确指出“打仗,简单地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更重要的是政治,包括根据地、人民群众、党、统战工作等,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⑧因此,大比武力图强化训练以解决和平条件下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主旨,显然没跟上毛泽东有关临战状态下对敌军事斗争的基本思路。而大比武中局部出现的锦标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脱离群众等问题,也极大地损害了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形象。

如果进一步探究,那么此时政治上“左”的错误的日益发展,则是大比武运动遭否定的深层原因。1950 年代后期,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判断出现问题,中共指导思想逐步向“左”偏移。之后的近十年里,尽管中共曾经试图纠“左”,但总体上“左”的错误在不断发展。解放军从高喊“政治挂帅”的口号,率先提出“活的思想教育”,到首先强调“突出政治”,都是中共指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238 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302 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323 页。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229 页。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253 页。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333 页。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 208 页。

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第 354 页。

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上的具体体现。政治建军是解放军的基本原则,中共指导思想每一次重要的发展变化首先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中得到反映和贯彻,正是这一原则使然。在阶级斗争理论视野下,毛泽东非常担心军队能否保持本色。1965年5月,他重回井冈山,与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公安部第九局(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谈话时,说“这次上井冈山,往事都想起来了,有些事还想说一说。我们军队里也不是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几十年来经常有人闹乱子。”^①可以说,毛泽东高度关注军队的思想政治问题。事实上,罗瑞卿等在组织大比武过程中,把军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置于同等地位,并注重两者的结合。叶剑英概括郭兴福教学法的五大特点,第一点就是思想红,用罗瑞卿的话说“它是一个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方法,是一个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的方法,也是一个发扬军事民主、依靠党、依靠群众的方法。”^②可见,大比武不乏那个时代浓烈的政治色彩。只不过是,大比武的组织者仍未跟上毛泽东的“左”的思想发展的步伐。1965年1月,在连续召开的三次军委办公会议上,罗瑞卿对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指示,作了适度的校正“对林总的指示要有全面正确的理解”,“所谓全面的理解,就是辩证的理解,而不是片面的理解,不要一下偏到这边,一下又偏到那边。就是说,要在政治统率军事、统率一切工作的原则下,把政治思想工作同军事技术,同各项具体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必须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不要犯单纯军事观点和单纯技术观点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使各项工作都过得硬,不要搞空头政治。”^③这是试图利用毛泽东曾经的正确主张校正其日益发展的“左”的错误,显然得不到毛泽东的赞赏。换言之,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更符合毛泽东的宏观意图。

20世纪六十年代,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牵引出的解放军大比武运动,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其由热而冷,既有政治上“左”的错误发展的原因,也是自身缺憾所导致的。毛泽东有关对敌斗争的战略指导,是很有远见的,以此为尺度,大比武确有差距。特别是这种突击性大规模的全军性技能比武,对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到底有多大实际作用,值得认真反思。时移世易,在解放军大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今天,充分汲取以往训练史上的经验教训,必然有利于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以扎实推进军事训练的改革创新。

(责任编辑 仲 华)

^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95页。

^②《罗瑞卿军事文选》,第690页。

^③《罗瑞卿传》,第305页。